

新闻 研究资料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

谢觉哉的新闻生活

印象深刻
的采访

随陶铸同志采访
报道新生事物一例
他不肯谈自己
深入到斗争第一线去

编辑手记

丁林商田金

王淮冰等

浪里忙流风

新闻研究资料丛刊

总第十六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
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编辑室编辑

中国展望出版社

新闻研究资料

总第十六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

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编辑室编辑

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80,000字

1982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7271·035

定价: 0.80元

目 录

谢觉哉的新闻生活

报国多方笔一枝

- 简述谢老的新闻生活……………丁 浪(1)

除旧布新 深入浅出

- 浅谈谢老主编的《湖南通俗报》……………丁 浪(53)

印象深刻的采访

随陶铸同志采访

- 《西行纪谈》答客问……………林 里(74)

拨云雾见青天

- 报道新生事物一例……………商 恺(86)

他不肯谈自己……………田 流(98)

深入到斗争第一线去

- 回忆浙江前线的采访……………金 风(109)

五十年代初期的一次采访……………白 原(124)

编辑手记

反面文章正面做

- 回忆一篇评论的写作……………王淮冰(135)

记三十多年前的一条电讯……………冯英子(128)

增和删……………甘惜分(138)

回 忆 录

在旧上海采访.....	唐 海(140)
访艺术大师梅兰芳和焦菊隐.....	孙世恺(149)
昆明四记者失踪的前前后后.....	刘乐扬(163)
我所接触的史量才.....	陆 诒(178)
沈阳《中苏日报》片断.....	贺逸文(183)

报 刊 史 料

《展望》周刊始末.....	尚 丁(187)
记湖南《抗战日报》.....	湛 震(198)
抗着逆流前进的《周报》.....	黄 彪(213)
上海开埠初期的重要报刊	
——近代报史初篇第七章.....	潘贤模(224)
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(八)	
方汉奇 谷长岭 冯 迈(237)	
本刊明年征订启事.....	(223)

报国多方笔一枝

——简述谢老的新闻生活

丁 浪

谢老(觉哉)一生同新闻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从参加革命到晚年，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他曾秘密地或公开地办过多种报纸，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，担负工农政府重要职务，仍然关心新闻事业，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，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，利用他的笔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六十岁诞辰时，董老(必武)赠他的诗可说是对他多年文字生活的评价：

曾读林公贺寿词，（即林老伯渠）

我来补贺又嫌迟。

传家绝业诗千首，

报国多方笔一枝；

屡有文章惊海内，

从无渣滓扰襟期。

流年算已周花甲，

好学深思老不疲。

谢老 1884年4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肖家湾，名维璽，字焕南，曾用笔名觉哉、焕南、飞飞、见心、马彬、敦夫等。二十岁时受父命参加“府考”、“道考”，是最末一科的秀才。

他中了秀才但并不去做官，却在一个蒙馆教书，他认为这是一个“干净”的职业，以免同流合污。

1913年，谢老在当时宁乡最高学府——云山书院教书，同何叔衡、姜梦周、王凌波同志共事，提倡白话文，被当权者认作“学匪”。1920年，36岁时赴长沙主编《湖南通俗报》。1921年由何叔衡、毛润之、东园介绍加入新民学会。同年6月15日《湖南通俗报》被迫停刊，谢老即到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书。

1925年在湘江学校，由何叔衡、姜梦周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6年，42岁，任《湖南民报》总编辑，并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、工人部长、党校秘书长、特别法庭委员等职。

1927年，“马日事变”，化装离开长沙，曾在汉口办过《大江报》。

1928年，44岁，他到上海，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《红旗》。

1929年主编《上海报》。

1931年秋，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，任中共省委政治秘书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党校教务长并主编《工农日报》。

1933年，到江西中央苏区，任中央政府秘书和毛泽东同志的秘书。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，以后，在政府部门担负重要职务，不再办报了，但始终是一位关心报刊的热情撰稿者。

主 编 《湖 南 通 俗 报》

(1920年9月12日——1921年6月)。

1920年以前，谢老一直在家乡教书，由于山乡偏僻，视野

受到局限。他自己后来在日记中曾经回忆过此时的心境：“我生的乡村是偏僻的，辛亥革命前几年，听到革命排满字样，还很骇怪，所以辛亥年的铁路风潮、武昌起义、长沙反正，我虽热烈赞成，但并无党派关系。以后，对时局常愤慨，喜接受新潮又常常令人感到失望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何叔衡同志约他到长沙主编《湖南通俗报》，何叔衡同志是谢老很好的朋友。他经常把新民学会的活动及各种见闻写信告诉谢老，常给他寄些进步书刊并介绍他同毛泽东同志认识。1920年9月至1921年6月，何叔衡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，邀请谢老主编《湖南通俗报》。办报初，毛泽东同志曾参加办报方针的讨论，谢老欣然接受众人所议，把办报纸得观点鲜明、通俗易懂，有力地揭露了湖南新军阀谭延闿、赵恒惕的虚伪面目及其政权的反动本质，同时传播了新思想、新文化、新智识，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办报期间，谢老比在教书时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各阶层的群众，调查社会现状，思想更为开阔了。1921年，何叔衡、毛润之、东园同志介绍他加入新民学会。他走上革命就是从办报开始的。

谭、赵对这样一张报纸非常害怕，1921年6月，借口何叔衡宣传过激主义，撤了他通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，报纸被迫停刊。（关于谢老主编《湖南通俗报》的情况，见另文。）

《湖南通俗报》停刊后，谢老又回到教育岗位，继续任教，但他并没有放下那支战斗的笔。1924年，他在宁乡甲种师范教书时，以飞飞等笔名在报上发表了《宁乡大沩镇团防局之黑暗再志》、《宁乡取缔私塾之波折》、《惨不忍闻之水灾消息》等三十多篇文章，揭露了旧社会之黑暗。1925年他给家里人写的信中曾谈到要改造中国社会的想法。信上说：“我看，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，必至亡国，说不定至于灭种。

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……。”何叔衡、姜梦周同志就在这一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主 编 《湖 南 民 报》

(1926年7月——1927年5月)

1926年，北伐军打下长沙后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半公开状态。中共湖南省委派谢老去主编《湖南民报》。他这个秘密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办报，只和罗迈（李维汉同志）、夏曦联系，不参加我党内生活。这一年，他42岁，他认为这是自己自觉走进革命的开始。在“六十自讼”中他曾这样叙述这段经历：“照例，人过四十，是走下坡路了，家庭、儿女、生活的牵连，锐气的渐降，不易再急进，就是以前急进的也不少逐渐后退，然而我不同。记得那时虽未知大革命会失败，然颇意识着革命是有波折的。我的弟弟因债累想缘我找点事，我给书云：‘革命前途未可知，我已以身许党，你不要来，免受牵累，你的债务，负责为你了之。’我就是这样于40岁以后踏进了一条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大路，且似乎是有准备地踏进这条路。”

谢老主编的《湖南民报》有这样几个特点：

1. 为北伐军和工农革命运动大造舆论。

谢老在主编《湖南民报》期间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，许多县成立农民协会，1927年初，农会会员发展到二百万人左右，能直接领导湖南农民之一半，可见规模之大。北伐军进湖南后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各地国民党党部、农民协会和工

人、学校和团体动员广大工人、农民和学生直接参战，大力支持北伐军，另一方面利用报纸大造舆论。《湖南民报》刊载了湖南工、农以及各界民众直接参战的情况。1926年9月29日一篇平江之役的报导，生动记载了工农大众支援北伐军的情景。

北伐军进入湖南后，《湖南民报》不断刊登各县农会纷纷成立的消息，大量报导1926年10月以后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深入发展的形势：一方面是农民把攻击目标对准土豪劣绅、不法地主，从政治、经济上猛烈地打击，并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，革命如火如荼；另一方面农村反动势力也迅速向革命势力反扑。各地的反动派普遍利用旧团防力量疯狂地残杀农民。

《湖南民报》陆续发表消息、文章对此作了揭露。

农民普遍遭团防局残杀，有些县的农会呈文请愿。《湖南民报》也选择刊登。谢老以“见心”为笔名，写了不少文章及时揭露反动势力的残暴，鼓动工农起来推翻反动统治。

2. 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最突出的是揭露“左社”事件的反动真面目，同刘岳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刘岳峙是湖南衡山县的大恶霸地主，国民党右派。当时他有钱有势，竟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担任农民部长。他对农民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恨之入骨，对宁乡农民杀了恶霸彭伯垓的革命行动表示十分愤慨，他本身就是农民革命的目标。1927年初，当蒋介石正酝酿反革命叛变，组织全国反革命阵线时，湖南国民党右派也十分嚣张，刘岳峙组织了一个“左社”。名为左社，实质是以他为首的一个国民党右派集团。他伙同省、市党部内一些国民党右派，利用职权扣留了省党部主张迁都武汉的

电报，扬言要改组湖南省党部，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他们保护地主阶级的所谓农民运动纲领，污蔑农协人员为‘地痞流氓’，要农民和地主“联络感情”，“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，农业改良之进步”，主张由国民党管辖各级农民协会，如“不服从纪律”，则“分别改组处究”等等。刘岳峙的这些“农运计划”获得了反革命分子的喝采和中间分子的拥护。社会上有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，还误以为“左社”是进步的组织，而上当受骗加入了“左社”。

谢老非常气愤，立即撰写和组织文章，在报上对刘岳峙利用“左社”搞阴谋进行无情的揭露，教育了那些上当受骗的青年，使其认清了刘岳峙名“左”实右的真面目。

3. 贯彻了共产党的指示，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。

谢老主编的《湖南民报》，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的指示，同人民的斗争息息相关，并敢于揭露国民党右派面目，巧妙地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，读者争相传阅。当时《湖南大公报廿周年纪念特刊》一书中，曾发表过黄胜一写的文章《过去之湖南新闻事业》，文中谈到：“1926年7月，湖南民报出版，极力为共产党张目，是为长沙新闻界之慧星。”从这也可看到《湖南民报》当时所产生的影响。

主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——《红旗》

(1928年11月20日——1929年4月)

马日事变以后，谢老于1927年底到了汉口。他同徐老（特立）一起还办过《大江报》。他给陶承同志《我的一家》写序

言时曾有过简单地叙述：“欧阳梅生同志，我只见过他一面，那是在他负责汉阳县委时的一次会议上。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，送《大江报》。我是当时《大江报》的编辑之一，环境恶劣，编报、印报、发报，都是单线。”可惜，《大江报》已找不到了。

1928年3月，谢老来到上海，从1928年初到1930年期间，秘密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——《红旗》和党所主办的公开报纸《上海报》。最近，我访问了当年在上海的钱希均、何实嗣、王延庆、朱仲丽等老同志，根据他们的回忆，了解到谢老在这期间办报刊的一些情况。

钱希均同志当年是中央的交通，负责同谢老联系的，据她回忆说：1928年春，有一天，她给周恩来同志（当时是党中央组织部长）送文件。周恩来同志让她转告毛泽民同志（当时出版发行部的负责人）说，过几天，湖南有一位老同志要来出版部找他谈有关《红旗》出版问题。这位老同志姓谢，很有办报经验的。并谈到他是一个人，怎样和他联系以及住房问题，出版计划等，请毛泽民同志先考虑一下。谢老接上头以后，钱希均同志发现谢老很想了解有关《红旗》印刷、发行等情况。当时，钱希均同志对外的身份是发行科长，来往于印刷厂，对情况熟悉，便一一告诉他。谢老也谈了一下对《红旗》恢复正常出版的设想，还问一周出两次行不行？钱希均同志说：“给我的印象是谢老这位同志很朴素、负责、细心。”

中午，毛泽民同志回来了。一进门，见到谢老，高兴极了，两个人拥抱起来。然后两个人靠得近近的细声地聊起来，从“四一二”蒋介石叛变，谈到马日事变，谈到大革命失败后，党从公开转到地下斗争更艰难了，但都充满信心。钱希均

同志说：“那天，谢老谈了很多马日事变的情况。”

毛泽民同志指定钱希均单线同谢老联系，送稿、取稿都由她一人负责。那时，环境险恶，不允许有很多的人搞采访、编辑和出版工作，写稿、编稿、校对大部份工作都是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就是编辑部。钱希均同志说：“我们给他在法租界找了一间不大的房间，除了一张桌子、一把藤椅外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。他不去我们印刷厂，都是让我把稿子送到我们党中央自己的印刷厂去排印、校对，经过一、二校以后，清样送他最后审定。我每次去他那里，总见他伏案埋头写稿或看书，很少有片刻的悠闲。一个人办报，除了编、写、校以外，还要经常到工人群众家里了解情况，非常紧张。他总不顾个人安危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那时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5块钱，除房租外，所剩吃饭的钱也很少了，吃得很简单，开始他不会打汔炉子，写累了就跑到街上吃碗阳春面或买个面包就算一顿了。我经常趁他看清样的时候，赶到街上给他买点吃的，帮他做饭，他喜欢吃牛肉炒细粉条、炒青椒。有时时间太仓促，他就叫我把清样留下，他校对非常细心，总是力争把文章编得通俗、易懂，深入浅出地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。他每周来我家两次，总是晚上来，把每期的选题给毛泽民同志看看。他一个人劳碌奔波，实在辛苦，但不以为然，还幽默地说：‘我不用汔炉，改烧炭炉，丢两块炭下去就着，上面放个茶缸，半缸子水，一把米，不用管它，过一会儿，文章写好了，饭也熟了。’”

《红旗》于1928年11月20日创刊，由于印刷条件等所限，样式大小不一。第一期至第四期为十六开本，每周一期，约三十页左右。从第五期到二十三期改为三十二开本，也是每周一期。大小两种全是刊登文章，没有新闻、通讯、广告等，是杂

志型的。从二十四期（1929年6月19日）以后，改成一张四开的报纸，每逢星期三、六出版。内容有社论、国内外消息、时事短评、工农斗争、红军消息、党的生活、国际妇女、副刊等。总共出了一百二十六期。到1930年8月2日发表了编辑部特别启事，提到：“因为革命形势的紧张，本刊的任务也随着更加重大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感觉到本刊每三日出一期，决不能满足目前全国革命发展的需要。因此，决定本刊与《上海报》合并，改为日刊，每日出版一张，定名《红旗日报》，现在积极筹备，定于8月15日出版，在8月15日以前，本刊还可以出一期。”

据现在中央档案馆内所存的《红旗》（从创刊到改为《红旗日报》为止）中，我们看到谢老从第一期到十九期（1929年5月1日），大都是写有文章，署名觉哉，有时也只用“觉”字，每期一至两篇，共有十一篇。1929年5月《红旗》改为报纸，党创办了《上海报》以后，谢老就没有在《红旗》上发表文章了。

这些文章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
（一）高屋建瓴，鼓动性强。

谢老这些文章都是揭露国民党对外卖国、对内压迫人民，反动腐败的。揭露的目的是为了要打倒它。文章观点鲜明，立意高，具有强烈的鼓动性，它号召人民起来，打倒国民党，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。这点同他以往的文章相比，就更有战斗性，更为明快有力。

谢老讲过：马日事变时，他是“十分模糊”的，当时看到长沙街头血肉横飞，心如刀绞，但是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，他还认识不到。直到1928年，中央派他去沈阳找地下省委，在沈

阳，他买到一本《列宁主义十二讲》，认真读了，联系起马日事变的实际，才懂得了大革命所以失败，是因为没有我们自己的政权、没有武装，由此深感抓武装、抓政权之重要。谢老的许多文章都从这个立足点出发，把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当众揭穿，以唤起人民取而代之。如：《国民党与鸦片烟》一文（刊于1928年11月20日《红旗》第一期），用大量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国民党似乎煞有介事设一个什么“禁烟委员会”，召开什么“全国禁烟会议”，无非是开给帝国主义看的。国民党同鸦片有“不解之缘”。党国要人、军人都要吃烟，要贩烟，一句话要靠它发财，根本不可能禁。文章提到：“冯玉祥究竟老实点，他在禁烟会演说：‘我到陕西潼关县，大堂上满贴县长亲笔写的禁吸鸦片标语，后来我到外面二、三十里地方，差不多遍地是烟苗，我非常奇怪，才知道他们是掩人耳目。’”文章列举武汉“雅室”遍市，长沙“雅室”遍市，广东把鸦片改成戒烟药，山东则“全省鸦片亩税达六千余万元”、“罌粟花夹津浦路而盛开”、四川“沿途饭店有‘买饭则无，买烟则有’之谣”、四川还“有懒捐名目，即对于不种烟之捐也。”

谢老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国民党禁烟不过是继承北洋军阀衣钵而更进一步，他的决议案自然都是些白纸黑字，与事实无关的。从前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，每年都有禁烟运动。这些禁烟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禁烟之先决条件是根本推倒军阀，军阀不打倒，一切禁烟会议禁烟决议案都是些欺骗民众的话，欺骗全国民众的话。全国民众都知道现在国民党的统治仍然是一种军阀的统治。因此，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，禁烟运动是没有希望的，他们的禁烟运动，其结果仍然是在‘寓禁于征’的招牌后面，更厚颜无耻地去进行包办包卖的勾当。”文章号召：

“全国民众们，你们想禁鸦片吗？请先打倒国民党的军阀统治！”

谢老对于国民党之对外卖国，对内镇压的本质，看得很透彻，文章写得很犀利，《立法院与秦始皇》（刊于1928年11月27日《红旗》第二期）最有代表性，现摘录如下：

立法院与秦始皇

中国本来是没有法的，法就是统治阶级的意旨。在统治阶级里面，也没有像西欧资产阶级的立法形式与所谓守法的习惯，完全看当权的那个人——皇帝，或者总统，主席，甚至正式绑票打劫的头领，他说的就是法，违抗他的就是犯法。国民党既是道地的中国国民党，自然他的法也是道地的中国皇帝乃至强盗头子的法……。国民党各系军阀各有各的杀人放火卖国殃民的自由“法”。

有人说国民党想学资本主义的德谟克拉西，那是洋货，不免恶化。然则大清律吗？太近代了；唐律吗？唐律虽说是中国律最完备的，可是犹嫌不古；那么，吕刑好了，他又与“成康郅治，刑措不用”的时期相近，不是斩杀的党治者所愿闻。拣来拣去，拣中一个秦始皇和汉高祖。11月16日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、最高法院院长林翔就职，中央委员戴季陶说：“中国在秦时立法最严，汉承秦之后，虽不如秦之严，亦能因缘秦法，而能统一寰宇。我们纵不能学秦之严，亦当守汉之法……”。

大家都知道秦汉时出了几个虎狼之君，以杀为业，“一人有罪，九族皆诛”……。杀人的法子，有五马分尸，腰斩，切脚筋，割肾子等等。

不用说，中国人民一年来因犯了国民党的法而死的，已有了一百多万，腰斩，剥皮，割乳，戳阴，火烧，无所不有。用

了商鞅的什伍之法，实行连坐；用了始皇的禁偶语之法，剥夺民众一切行动言论自由。并且用机关枪扫射，及密布新式侦探，这是秦汉时所没有的。戴季陶犹说“我们纵不能学秦之严”未免太自谦了……

这是匕首，是檄文，对于蒋介石“朕即国家”的法，形容得淋漓尽致。

这个时期，谢老有三篇文章是揭露国民党卖国外交的，其中《床次来华与国民党之卖国》一文（刊于1928年12月25日《红旗》第六期）分析了国民党各派都是卖国的，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后指出：“总而言之，床次来华是日本统治阶级向中国统治阶级完结一桩卖国交易，同时因英帝国主义的醋劲，惹起各派走狗的争噬。”、“国民党无论那一派，都是帝国主义的头号走狗，只有打倒国民党，国贼才可开除，只有建设工农独裁的政权，外交才能胜利。”

（二）嬉笑怒骂，文风泼辣。

谢老常用杂文的笔法，嬉笑怒骂、冷嘲热讽、笔锋犀利，把国民党人丑恶的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如：写国民党卖国外交，用的是“国民党拍卖中国”一词，“拍卖”二字，既通俗又传神。《在日本退回照会的原因》一文（刊于1928年12月18日《红旗》第五期），一开头就说：“上海日本总领事退回国民政府关税自主及过渡差等税率的照会，这是国际上很不礼貌的事，在素以奴隶自居的国民党，当然不算什么。我们要研究的，就是国民党用尽吃乳的力巴结日本，为什么日本还要给国民党这样丢脸？”文章通过日本同国民党勾结的一系列事实，